

皮日休詩文選注

● 申宝昆

选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4.22

42

皮日休诗文选注

申宝昆 选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皮日休诗文选注

申宝昆 选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兵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插页2 印张5 字数105,000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,000

ISBN 7-5325-0857-9

I·477 定价: 1.95 元

前 言

在群星灿烂的唐代文坛上，皮日休虽然没有李白、杜甫那般璀璨夺目，但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。中国文学史上，有其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
皮日休是唐代，甚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著名文学家中，唯一参加过农民起义的诗人。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但很遗憾，对这样一位重要作家，正史没有为他作传，历代许多杂史笔记、文学史著作，对他的论述也极为简略，造成了研究工作中的困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许多专家撰写过不少专门论文，对皮日休的研究逐步深入。但由于资料太少和社会思潮的影响，意见很不一致，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。因此，我们对皮日休的生平、思想、创作情况，仅能作一个粗线条的描述。

皮日休，字逸少，后改袭美，自号“闲气布衣”、“醉吟先生”、“鹿门子”等，湖北襄阳人，大约生于唐文宗太和末年至开成初年（公元 834 至 838 之间），出身于一个庶族地主家庭。青少年时代，在襄阳鹿门山读书。咸通四年（863）初，离家出游，从襄阳出发，沿汉江南下达湖北东部，又至湖南沅湘、江西北部。从九江渡江到安徽，再至河南，由南阳入蓝田关，到达京

师长安。这次长途漫游，一方面是为开阔视野，更重要的目的是“以文事造请”，即以自己的诗文去进谒名流权贵，以便考取进士。咸通六年十月入京，准备参加进士考试。咸通七年春，应试不第，便取道洛阳，退归寿州（今安徽寿县），大约在朋友资助下于州东设别墅，编次自己的诗文集《文薮》，作为“行卷”，以备次年再度应试。咸通八年以榜末进士登第，但没有立即得到官职。咸通九年，又离京东游华、嵩诸山，经洛阳，乘舟抵达扬州，然后渡江到苏州。咸通十年，在苏州刺史崔璞幕下做郡从事，与吴中名士陆龟蒙结为诗友，过从甚密，酬答唱和，写下许多诗篇，后辑入《松陵集》。咸通十三年春回京都，为著作佐郎、太常博士。僖宗乾符二年（875），王仙芝起义后，皮日休又回到吴郡，为毗陵（今江苏武进）副使。乾符五年，黄巢起义军渡江入浙西，皮日休参加了起义军。广明元年（880）十二月五日，黄巢起义军攻下长安，十三日黄巢称帝，以皮日休为翰林学士。中和四年（884），黄巢起义军失败，皮日休不知所终。

关于皮日休的下落，正史没有记载。后人笔记杂著中不少传闻，可归纳为三种：一为黄巢所害；二为朝廷所杀；三为逃奔吴越，投靠钱镠。

持第一说者最多，如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、钱易《南部新书》、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均从此说。《唐才子传》记载最详：“乾符丧乱，（日休）东出关为毗陵副使，陷巢贼中。巢惜其才，授以翰林学士，日休惶恐跼蹐，欲死未能。劫令作讖文以惑众，曰：‘欲知圣人姓，田八二十一。欲知圣人名，果头三屈律。’贼疑其裹恨，必讥己，遂杀之。临刑神色自若，无知不知，

皆痛惋也。”这种说法影响很大，连今人郑振铎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也取此说。实际上并不足信，当代多数学者都否定此说。皮日休自乾符五年便从军起义，广明元年黄巢称帝时任翰林学士，如有作谶一事，当在黄巢称帝之前。从时间上讲，此说与事实不符。四句谶语是“黄巢应当称帝”的意思，并非讥讽，黄巢又颇具文才，不会连谶语的含义也不懂。

第二种说法，是被唐朝统治者所诛。此说见于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转引《该闻录》（此书已佚）上的记载：“皮日休陷黄巢，为翰林学士，巢败被诛。”陆游认为此说不可信。但今人萧涤非、郑庆笃等，认为此说最可信。因为唐王朝血腥镇压了这场农民起义，对起义有关人员格杀勿论，对一个中过进士的官吏从“贼”而且接受伪职的皮日休不会放过。据此，郑庆笃推论皮日休当死在中和三年，即公元883年。

第三种说法是逃奔吴越，投靠钱镠。北宋尹师鲁为皮子良写的墓志中说：“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，徙籍会稽，依钱氏，官太常博士，赠礼部尚书。”陆游据此，更为明确地说：“则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也”，并要“为裘美雪谤于泉下”。这就否定了前两种说法，因为根本没有“陷贼”。此说为多数学者所不取。

但近年来又发展了这种说法，认为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军，巢败后奔吴越。李菊田据《五代史补》卷一“杨行密钱塘侵掠”条，说明在天复二年（902），田頔围攻钱塘时，皮日休犹健在钱镠幕中。时黄巢已死十九年，可知黄巢没杀皮日休。据此，缪越也认为“皮日休为黄巢所杀，或为唐代统治者所杀诸种说法均不能成立，而逃奔吴越，依靠钱镠，乃是皮日休的结局”（《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》）。此说为不少学

者所接受。但仍有诸多疑点,还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唐代末年,政治腐败,民不聊生,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,李唐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。在这大衰变时代的知识分子,特别是像皮日休这种出身的人,思想往往是十分复杂的。

皮日休也和同时代其他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样,青少年时期受的是儒家教育,“家资是何物,积帙列梁栳。高斋晓开卷,独共圣人语。”(《读书》)在圣人经典的熏陶下,皮日休思想的主流是儒家思想。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涉及全部儒家经典,对儒家所推崇的人物,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公、孔丘、孟轲、荀卿、贾谊、扬雄、王通等人都倍加颂扬。他说:“圣人之化,出于三皇,成于五帝,定于周孔。其质也,道德仁义,其文也,诗书礼乐。此万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。”(《原化》)他认为儒家学说是万古不移的治世之道。赞颂孔子是“迈德于百王,垂化于万世”(《补大戴礼记》),“仲尼之化,不及于一国,而被于天下;不治于一时,而需于万世”(《文中子碑》)。因为孟子“叠踵孔圣”“翼传孔道”,所以皮日休建议朝廷“去庄列之书,以《孟子》为主。有能精通其义者,其科选,视明经。”(《请〈孟子〉为学科书》)要求把《孟子》列为选拔人才的考试科目。

对唐代儒学大师韩愈,皮日休也推崇备至。认为韩愈是孟子、荀卿、王通之后儒学的当然继承人,“夫孟子、荀卿翼传孔道。以至于文中子,文中子之末,降及贞观、开元,其传者醺,其继者浅。……文中子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,唯昌黎文公焉。文公之文,蹴杨墨于不毛之地,蹂释老于无人之境,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。”(《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》)因此呼吁把韩愈列入圣贤之班,“配飨于孔圣庙堂”。

皮日休对孔孟如此推崇，并竭尽全力为儒学张目，其目的是要重振儒家道统，以维持李唐王朝的统治。但他毕竟是出身于不很富裕的中小地主家庭，是比较接近下层人民的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。所以他对儒家思想的继承，主要是孔子的“仁者爱人”的“仁政”思想和孟子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“民本”思想。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倾向的。基于此，皮日休大声疾呼统治者要施仁政，大胆地、真实地、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他充分发挥了孟子的“民本”思想，指出“古之取天下也，以民心；今之取天下也，以民命”（《读司马法》）；“古之杀人也，怒；今之杀人也，笑”（《鹿门隐书》）；“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，则扼其吭，摔其首，辱而逐之，折而族之，不为甚矣”（《原谤》）。皮日休以激愤的心情，抨击了晚唐的黑暗现实和腐败政治。这种反暴君暴政的思想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是相当大胆的。

基于这种民本思想，他对贪官污吏给予了无情的鞭笞：“古之置吏也，将以逐盗；今之置吏也，将以为盗。”“古之决狱，得民情也，哀；今之决狱，得民情也，喜。哀之者，哀其化之不行；喜之者，喜其赏之必至。”（《鹿门隐书》）这种思想的进步性，已超越了同时代其他文学家。

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，以天下为己任的。但一般儒者的处世态度是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，而皮日休却极力反对“独善”和“保身”的主张。他在《鹿门隐书》中对伯夷提出反传统的观点：“伯夷不事非君，谁行其道？不治非民，孰急天下？”还说“古之隐者，志在其中，今之隐者，爵在其中”，尖锐地指斥那些企图通过隐居来走终南捷径平步青云的人。

儒家思想中这些积极的因素，是皮日休后来能够参加黄

樂起义的思想基础。但我们也应看到，皮日休受儒家思想消极因素的影响也很深。他大力宣扬儒家的封建伦理，企图发挥其教化作用，挽救摇摇欲坠的唐王朝的统治。对待人民的态度也有其阶级偏见，他在《鹿门隐书》中认为民性多是暴、逆、纵、愚、妄，要导之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这都是时代和阶级给他的局限。

唐代统治者对思想界是比较开放的，儒释道三家思想都加以提倡，因此，佛老思想也不会对皮日休毫无影响。特别是及第后的境遇，使他“立大功、至大化、振大名”（《皮子世录》）的理想破灭，佛老思想在他头脑中有所增长。表现在创作上，远没有了早期那种直面地、大胆地干预现实的热情，寄情山水，歌颂隐逸的作品大量增加。特别是在苏州作郡从事期间，和陆龟蒙诗酬唱和，游戏文字，简直是超然物外的隐士。农民大起义的狂涛把皮日休卷入之后，想来他的思想该会发生极大的变化，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看不到他参加起义后的作品，因此不能妄加评论了。

晚唐文坛呈现纷繁驳杂的景象。一方面是浮艳的形式主义文风重新抬头，如韩偓、吴融之流，刻红剪翠，典丽精工，形成所谓“香奁体”。另一方面继承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传统，更直面地干预现实、揭露社会的黑暗，如聂夷中、杜荀鹤等。

由于皮日休思想的复杂，在创作上所受影响也是多方面的，不同时期创作倾向有明显的差异。及第前的《文薮》中所辑诗文，基本上属于后一类，多是现实性较强的作品。而及第后的《松陵集》中的诗歌，则多表现田园隐趣，风格迥然不同。

皮日休在创作理论上，强调文学“裨补时政”的社会功能，

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。《文薮》序言中说：“伤前王太快，作《忧赋》；虑民道难济，作《河桥赋》；念下情不达，作《霍山赋》；悯寒士道壅，作《桃花赋》。”说自己的创作“皆上剥远非，下补近失，非空言也”，甚至连“状花卉，体风物”也是“非有所讽，辄抑而不发”（《桃花赋序》）。对于诗歌创作，他说：“诗之美也，闻之足以观乎功；诗之刺也，闻之足以戒乎政。”（《正乐府十篇序》）特别强调诗歌的歌颂和讽刺的功能。

“剥远非”、“补近失”、“观乎功”、“戒乎政”是皮日休文学思想的核心，是对中唐韩愈、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。

正因为皮日休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如此重视，所以他极力主张文学要有社会内容，反对空泛无物、浮艳绮丽的文风。对唐以前的重要作品作家及流派，差不多都作了很有见地的评论。

他肯定《诗经》的现实主义传统，慨叹建安以后《诗经》六义的丧失。他赞扬屈原反映现实的精神，认为屈原“正诡俗”、“辨穷愁”的忠于现实的精神，没为后代诗人所继承。他批评宋玉、王褒、刘向、王逸等人学习屈原只“得芝兰之芬芳，鸾凤之毛羽”，因而和屈原较，“皆相去数百祀”。他对西汉进步作家贾谊十分推重，非常赞扬贾谊的“经济之学”及其关心现实的精神。他否定南朝以来的绮丽文风，对唐代大诗人如陈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，都高度评价他们诗文的现实主义内容。

他抨击晚唐乐府已失去原来的意义：“今之所谓乐府者，唯以魏晋之侈丽，陈梁之浮艳，谓之乐府诗，真不然矣！”（《正乐府十篇序》）因而他要通过创作实践来纠正这种不良倾向，把现实中“可悲可惧者，时宣于歌咏”（同上），写成十篇乐府诗，并名之曰“正乐府”。

皮日休的创作，特别是早期创作，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。他亲手编定的早期诗文集《文薮》，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精华。《文薮》共十卷，文章占九卷，除《全唐文》辑录的七篇短文外，皮日休的文章几乎全部集中在《文薮》中。体裁多样，内容丰富，可谓“皆上剥远非，下补近失”，力求做到“句句考事实，篇篇穷玄虚”（《奉酬崔璐见寄》）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皮日休及第前的思想和生活面貌，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特别是那些政论小品，更富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。

皮日休的文章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鲜明的爱憎，强烈的感情。如《祝疟疠文》，把危害人们健康的疟疾病，写成有知的东西，作者激愤地咀咒了社会上各种害国害民的谗佞奸邪之徒，要疟疠“见仁义而勿疠，遇奸佞而肆凶”。《鹿门隐书》之四十二，“或曰：‘我善治苑囿，我善视禽兽，我善用兵，我善聚赋。’古之所谓贼民，今之所谓贼臣。”这里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上那些享乐腐化、制造战事、盘剥人民的统治者的强烈憎恨。《原谤》则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，对那些“不为尧舜之行”的“后之玉天下者”，作者认为人民可以起来杀掉他，甚至灭族都不算过分。这种大胆的见解，最足以表明皮日休鲜明的爱憎。对自己所崇敬的人，则倍加赞扬，热情讴歌，如《文中子碑》、《刘枣强碑》、《郢州孟亭记》、《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》、《请孟子为学科书》等。

皮日休的论说文，论点鲜明，说理透辟，有极强的逻辑性。如《鹿门隐书》之十七：

伯夷不事非君，弗治非民，治则进，乱则退。吾得志，弗为也。不仕非君，孰行其道；不治非民，孰急天下。以非君乎？汤不当事桀，文王不当事纣也。以非民乎？桀民不

赴殷，紂士不归周矣。故伯夷之道过乎高，吾去高而取戒也。

这里论述了隐退和出仕的关系，皮日休一反传统的观点，对后世称颂的“不食周粟”而饿死首阳山的伯夷，给予非议。批评了伯夷这种逃避现实的态度，说明愈是乱世愈需要治世济民之才，表明了作者积极用世的观点。

在《汴河铭》中，皮日休反对统治者劳民，但对隋炀帝开凿运河一事，却与传统观点不同。认为“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，在唐之民，不胜其利也”。这样辩证周密的论述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。

皮日休文章的另一特色是短小精悍，一事一题。他很少作长篇大论，常针对某一问题立论分析，简明扼要，意尽而止。如《鹿门隐书》之三：“文学之于人也，譬乎药，善服，有济。不善服，反为害。”短短十九字，提出一个深刻的论题：人们对文学作品，要有选择地汲取其有益的东西，扬弃其有害的因素。这已是近代所谓“接受美学”的论题了。《鹿门隐书》之二十三：“小善乱德，小才耗道。”只有八字，说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。对有些内容繁杂的论题，则分门别类一事一议，组成一组文章，如《十原》、《六箴》等。这样每篇短文突出一个主题，给读者以深刻强烈的印象。

皮日休的文章常用对比手法借题发挥。《鹿门隐书》共五十七篇，其中用古今对比手法者，竟达八篇之多。除上文引述者外，又如：

古之官人也，以天下为己累，故己忧之；今之官人也，以己为天下累，故人忧之。（其十一）

……古之奢也俭，今之奢也滥。古之俭也性，今之俭

也名。(其二十)

古之用贤也，为国；今之用贤也，为家。(其五十四)

这种方法，借“颂古”来“非今”，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中黑暗政治和丑恶世态的强烈愤慨。

当然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皮日休散文中也有不少孔孟之道的说教。有的文章铺张扬厉，显得冗长拖沓。但瑕不掩玉，皮日休的散文，特别是政论小品，鲁迅先生誉之为“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（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）。

《文薮》中仅有皮日休诗歌一卷，凡四十六首，为及第前诗作。另外《松陵集》约三百余首，多为及第后与陆龟蒙的唱和之作。前者数量虽少，但绝大部分都是为现实而发，是皮诗中的精华。后者数量虽多，但内容空泛，思想价值不高，几乎完全丧失了早期诗歌的现实性。皮日休的前期诗歌，继承了杜甫、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疾苦，是晚唐诗坛上的优秀诗篇。如《三羞诗》其三：

天子丙戌年，淮右民多饥。就中颖之汭，转徙何累累。夫妇相顾亡，弃却抱中儿。兄弟各自散，出门如大痴。一金易芦菔，一缗换凫茈。荒村暮乌树，空屋野花篱。儿童啮草根，倚桑空羸羸。斑白死路傍，枕土皆离离。……

这首诗真实地描写了淮右蝗旱，人民离乡背井，妻离子散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。面对这目不忍睹的惨状，诗人联想到自己“橐有囊，饔有炊，晏眠而夕饱，朝乐而暮娱”的悠闲生活，而感到羞愧。这和白居易《村居苦寒》中所表现的思想相似，显示他与中唐新乐府诗歌的精神一脉相承。

皮日休的组诗《正乐府十篇》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现实。对不合儒家仁政的社会弊端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，对人民的深重

苦难，寄予了极大同情。最为人们称道的是《橡媪叹》，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贫苦老妇人形象，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贫困，有力地鞭笞了那些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的贪官污吏。其思想性、艺术性与最优秀的唐诗相比也毫不逊色。此外像《农父谣》、《贪官怨》、《哀陇民》等，也都是现实性极强的诗歌。

皮日休是位博采众家之长的诗人，他对杜甫、白居易十分推崇，对李白、孟浩然等也倍加赞赏。因而他的诗歌内容比较复杂，艺术风格也不完全一致。

皮日休及第前，面对晚唐黑暗现实，满怀激愤之情，其诗歌创作很容易接受杜甫、白居易的影响。早期诗歌那深刻的思想内容及平易通俗的语言风格，显然是白居易的诗风。其《橡媪叹》和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内容和风格上就十分近似。

他赞扬李白“言出天地外，诗出鬼神表。读之则神驰八极，测之则心怀四溟，磊磊落落，真非世间语者”（《刘枣强碑》）。因此，有些绝句又颇有太白遗风。如：

醒来山月高，孤枕群书里。酒喝漫思茶，山童呼不起。（《闲夜酒醒》）

万顷湖天碧，一星飞鹭白。此时放怀望，不厌为浮客。（《秋江晓望》）

这些小诗，与李白那些清新隽永的抒情绝句又何其相类！

但皮日休及第后，仕途上的不顺利，使他失去了早年的政治热情，其诗作几乎完全没有了现实性。特别是在苏州做郡从事期间，结识了陆龟蒙等几位隐士，陆等作为隐士的生活态度，深深地影响着皮日休，使皮日休思想中原来就有的佛老思想日益扩大。这时，皮日休虽不算富贵显达，但公务之余，游山玩水、饮酒赋诗、悠游自得，与早年那“贫家烟爨稀，灶腹阴

虫语。门小愧车马，麝空惭雀鼠。尽室未寒衣，机声羨邻女”（《贫居秋日》）的生活相较，可谓天壤之别矣，“吁嗟逢橡媪，不觉泪沾裳”（《橡媪叹》）的感情似乎已不复存在。

这一切，促使皮日休的创作倾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对他早年在《刘枣强碑》中所唾弃的“艳伤丽病”的形式主义诗风，转而欣赏仿效起来。《松陵集》中大部分诗篇都有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，几乎看不到时代的影子。像咏渔、咏樵、咏酒、咏茶诸篇，与《三羞诗》、《正乐府》相较，简直如出两人之手。至于双声、叠韵、药名、联句之类，更不过是庸俗的文字游戏而已。这时期的诗歌中，虽然也有像《馆娃宫怀古》、《金钱花》等借古讽今、借物喻人，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作品，但如果说早期的《三羞诗》、《正乐府》是黄钟大吕，那么，这些诗篇的音调，就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了。

皮日休后期诗歌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，显然是受韩愈的影响。韩诗虽也反映现实，但特别重视艺术形式，“丰而不余一言，约而不失一辞”（韩愈《上襄阳于相公书》），锤字炼句，追求奇险，甚至僻涩。皮日休继承并发展了韩诗这些特点。后世论及皮诗，也多以这部分诗歌为依据。所以沈德潜说皮陆诗是“另开僻涩一体”。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说皮日休“未第前诗，尚朴涩无采，第后游松陵，如《太湖》诸篇，才笔横开，富有奇艳句矣”，更具体地指出皮日休艺术风格上的变化。

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皮日休在唐诗向宋诗转变中的作用。一般论者追溯宋诗的滥觞，常推盛唐杜甫及中唐韩愈、孟郊，以为是他们直接开启宋诗风气。其实从韩、孟到宋人，中间还有半个多世纪的岁月，不可能是一片空白。有些诗人在韩、孟与宋人之间，是起着桥梁作用的，皮日休就是其中重要

的一员。

皮诗中的议论手法，大量运用典实故事，以散文句法入诗，以虚字入诗，特别是以赋法为诗等方面，较之韩、孟都更接近宋人。正如袁枚在《小仓山房文集》的《答沈大宗伯论诗书》中所说：“初盛一变中晚，再变至皮陆，已浸淫乎宋氏矣。”皮日休在唐诗向宋诗发展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

本书共选散文四十七篇，诗歌六十三首，是皮日休作品中的一部分。希望读者通过本书，对皮日休的创作能有个大致的了解。所选诗文的底本，主要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萧涤非、郑庆笃整理的《皮子文藪》。

皮日休的诗文问世以来，一直没有注本或选注本，甚至在一些唐代诗歌散文的选本中，对他的作品也选录甚少。这就使今天的注释工作得不到借鉴。我尽力之所及，希望能基本上做到正确。每篇都作了简要说明，以期帮助读者掌握诗文主旨，注释也力求详尽。但由于能力所限，舛误之处在所难免。恳切地希望专家、读者批评指正。

本书在选注过程中，枣庄师专鲍延毅教授，曾帮助选题，山东大学董治安教授、曲阜师范大学刘乃昌、戴胜蓝教授、崔海正同志，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。本书出版过程中，得到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资助。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！

本书前言的撰写，参照了郑庆笃同志的《皮日休评传》。特作说明，并表示感谢。

申宝昆 1989年春

目 录

文

文藪序·····	1
河桥赋并序·····	3
桃花赋并序·····	9
原化·····	14
原宝·····	16
原用·····	17
原谤·····	18
文中子碑·····	19
刘枣强碑·····	23
汴河铭·····	27
祝疟疔文·····	29
读司马法·····	31
相解·····	33
惑雷刑·····	37
悲挚兽·····	38
鄂州孟亭记·····	39